
西方人在华博物馆的本土化转向

——以震旦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为例

蒋凡^{1、2} 项隆元¹¹

(1. 浙江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27;

2. 浙大城市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7)

【摘要】:以震旦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为代表的西方人在华建立的博物馆,除了是西方在华文化殖民的表现外,还是西方在华收集自然史信息的机构,旨在开展自然史标本收藏和研究工作,以服务西方自然史研究和了解中国的需求。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们开始重视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作用,展览和社会教育成为这些博物馆的重要活动,并以此向中国社会开放。这一转变不仅是这些博物馆自身发展的要求,也受到中西博物馆思潮发展的影响,还顺应了博物馆在地文化发展的需要,是这些博物馆从服务西方需求转向服务中国社会的体现。

【关键词】:震旦博物院 上海博物院 近代博物馆史 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G260 **【文献标识码】:** A

西方人在华建立的博物馆是中国近代长期存在的文化现象,因此并不能仅将其视为一个一成不变的整体。仅就以自然史标本收藏和研究为开局的震旦博物院¹和上海博物院²而言,两者都是西方在华建立时间较早、存在历史较长和产生影响较大的博物馆,从其几十年历史中所表现出的变化看,两者都有从以自然史标本收藏和研究为主向重视展览和社会教育、从服务西方智识到向中国社会开放这种本土化转向的努力。它们尝试从西方在华的自然史研究机构转变为向中国社会开放的文化机构,这一本土化转变趋势是近代西方在华博物馆活动的一个缩影。

一、西方人在华博物馆本土化转向的表现

震旦博物院的前身徐家汇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的前身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院(以下简称“文会博物院”)是西方人在华建立时间较早的一批博物馆,除了作为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外,它们的建立还有了解中国自然历史情况的目的,因此它们早期的活动围绕着自然史标本的收藏和研究展开。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徐家汇博物院和文会博物院都建立了新的馆舍,这些新成立博物馆都表现出了与其前身仅注重自然史标本收藏及研究不同的思路,它们开始关注中国社会的需求,展览和社教功能的发挥成为其工作的重点。

¹作者简介:蒋凡(1992—),男,浙江大学与浙大城市学院联合培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学。项隆元(1963—),男,浙江大学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学研究所副所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考古与文博系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物质文化遗产、考古学、博物馆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革命文物展览的爱国主义教育效果评价与提升研究”(21CKS057)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博物馆定位的变化：从自然史收藏研究机构到公共博物馆

1. 西方在华自然史的收藏研究机构

徐家汇博物院和文会博物院在建立之初都是为自然史标本收藏和研究而建立的专门机构，收藏和研究占据了它们工作的主要内容。

徐家汇博物院是基于西方对中国自然史研究的需求而建立。早在 1866 年，法国天主教会曾讨论过中国自然史研究在中国天主教传播中的作用³。1868 年皮埃尔·韩伯禄（Pierre Heude）来华后即“主要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传教活动”⁴。直到 1872 年 8 月，在华天主教会决定在徐家汇成立“江南科学委员会”（Comité Scientifique du Kiang-Nan），并提出由曾在法国巴黎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学习过的传教士韩伯禄“基于他的研究和收藏在徐家汇建立一个博物馆”⁵。1883 年博物馆的主体建筑在徐家汇耶稣会总院的南侧建成，徐家汇博物院成立。徐家汇博物院的建立为天主教会在华开展自然史研究提供了基地，当时报道称“为了配合耶稣会在徐家汇的使命，他们建立了一个以自然博物馆为形式的机构”⁶。

文会博物院的建立同样是为西方人在华的自然史研究服务。该馆的建设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以下简称“文会”）在其前身上海文理学会成立时就提出研究中国自然史的需求，“本会调查研究的领域主要是中华帝国及其周围的国家，并研究这些地方的自然历史和文化”⁷。为了实现此目标，文会决定成立博物馆⁸。1871 年文会会所成立，其二楼一间被用作博物馆（后扩充为两间）。自然史标本构成了该馆的主要收藏。在 1876 年的文会报告中，博物馆馆长威廉·伯吉斯·朴赉懿（William Burgess Pryer）指出由于“在中国进行自然历史研究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参考”，博物馆的建立“显然是朝着解决这一困难所迈出的第一步”，朴赉懿进一步认为该博物馆应作为“中国所有与自然历史相关的学科的信息中心”⁹。在 1878 年的文会主席致辞中，时任主席托马斯·金思密（Thomas Kingsmill）直接使用了“我们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称呼文会的博物馆¹⁰。1884 年时任馆长弗雷德里克·史丹阳（Frederick Styan）在报告中提出，“不论是哺乳动物、鸟类还是爬虫类、鱼类，我们想要关于这个国家自然历史的一切藏品”¹¹。这都反映了这座博物馆明显的以自然史收藏和研究为主的建设倾向。

2. 重视社会作用的公共文化机构

前文这种将博物馆作为专事自然史收藏研究机构的做法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了极大改变，两座博物馆都开始关注发挥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社会作用。

这一时期，徐家汇博物院开展大量的科研活动使博物馆空间“物品之数渐增，徐汇旧舍已不敷应用”¹²，“五十余年来所有搜集动植物标本已夥，徐汇院屋实有不足陈列之势”¹³，于是徐家汇博物院向天主教会提出了建设新馆舍的需求。这符合当时天主教会对于徐家汇博物院的要求。早在 1916 年，“法国总领事 Naggiar 就与天主教传教士 Gilot 和震旦大学校长姚纘唐一起制定了一项总体计划，计划在震旦校园内建立一座向公众开放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此计划“考虑将徐家汇博物院与当时的震旦大学结合起来”¹⁴。这样的计划也得到了震旦大学方面的支持，1929 年桑黼翰（Père Lefebvre）校长表达了“对徐家汇博物院的迁移和新馆舍建设的全力支持”¹⁵，震旦大学希望“新加入的自然史博物馆将为学校内原有的医学、理学学生增加实际观察经验、丰富课程内容”¹⁶。1930 年 4 月 26 日，新的博物馆开始建设，并定名为“震旦博物院”（Musée Heude）。经过这一重建，徐家汇博物院从直属在华天主教会的自然史研究机构成为震旦大学的附属机构，并被赋予向中国社会各界开放和服务震旦大学教育的责任。

文会博物院随着收藏的积累，意识到无法满足向公众展览的问题，于是展开了重建工作。文会在 1922 年的报告中就提到“非常需要一个更大更合适的博物馆建筑”¹⁷，需要更大空间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其收藏空间不够，而且文会注意到过去狭小的空间也不利于观众参观。文会不断提出博物馆“没有地方展出博物馆里所有不同种类的动物”¹⁸，“由于博物馆房间面积有限，无法令人满意地展示这些标本”¹⁹等因空间不足而造成的展览问题。文会开始考虑在原有博物馆空间采用新方式布置展览，将藏品“分

门别类地放置在一起，这使得展品本身也变得更具有吸引力”²⁰。1933 年文会博物院重建，并以“上海博物院”的名称重新开幕，文会明确提出“要为上海社会所用，使公众能在闲暇之余参观”²¹的建设目标。上海博物院负责人的头衔从 curator 变为 director，“旧职位因过时而被废除”²²，这一“过时”即指以收藏保存为目的的 curator 已经不能满足上海博物院想要举办展览的需求，改为 director 意味着博物馆负责人不仅需要对收藏负责，这一职位还被“授予了进行陈列柜安装的权力”和负责“向公众开放”的事务²³，这也反映出博物院需要其负责人对举办公众展览负责的意图。

（二）博物馆功能的变化：从重视收藏研究到重视展览

1. 以自然史标本收藏和研究为主

徐家汇博物院和文会博物院的建立为西方人在华开展自然史研究工作提供了自然史标本收藏和研究的场所。从两者建立之初的情况看，博物馆空间都不大，而且都被用作标本收藏室。徐家汇博物院是一座有两个大厅和两间实验室的单层建筑，后任馆长奥克塔夫·郑璧尔（Octave Piel）曾评价徐家汇博物院的空間“对普通好奇的人来说并不友好”²⁴。徐家汇博物院虽然以“博物馆”的名义建设，但并不围绕展览开展具体工作，而是重视博物馆的收藏功能。与重视自然史藏品收藏功能对应，自然史研究工作占据了博物馆工作重心。比如韩伯禄意在将徐家汇博物院建设为自然史研究的中心，“该院最初的宗旨原为著述发表，所以完全是注重在研究方面的”²⁵。在这一思路下，该馆成为“一个研究人员满意的研究型博物馆”²⁶。

文会博物院起初的展览空间很小，在亚洲文会大楼落成后，仅将二楼的一间作为博物馆场地。1878 年馆长阿尔伯特·福威乐（Albert Fauvel）提出随着藏品的增加，“我们必须更新对空间的要求”²⁷，直到 1880 年博物馆的展览空间才变成两间。1920 年的《上海指南》中提到文会博物院：“室凡二间。右贮兽类（如獐猫狼豹猴野猪刺猬等）及贝介类蛇类鱼类矿类之所在。左贮禽类（大半皆中国产）蛾蝶类鸟卵鸟巢矿苗之所”²⁸。这一时期，文会博物院已收藏有“鸟类标本 3000 余种……哺乳动物收藏价值已逾一千五百元，爬行和两栖动物有 1500 余种”²⁹，加之其意在建设为“中国自然史信息中心”，可以看出文会博物院对收藏的重视。

2. 展览成为震旦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的重点

（1）展览空间成为重要部分

重建后的震旦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都摆脱了原本狭小的空间束缚，扩建场地为展览的举办提供了可能。1931 年，震旦博物院建设完成，“院舍为 L 字形，计三层，每层厅的总长度约八十公尺”³⁰。其总体规模较其前身大了许多，并规划了专为博物馆展示的空间。其中院内“分为两个完全不同和独立的部分”³¹，其中临近吕班路、便于公众参观的部分被规划为展览部分，以方便民众自由参观。博物院的展览部分分为三个陈列室³²，其中“第一第二陈列室都可以自由参观”³³。上海博物院重新开馆后的展览空间也变大了，从原来的两个大房间变成占据新文会大楼第三、第四和第五层楼，第三层是自然史藏品的展览，第四层是中国考古学及艺术品的展览，第五层是美术品的展览。

（2）重视展览内容和方式

震旦博物院的中国古物展览内容更加丰富，其中第一陈列室用作“陈列古物”³⁴，其藏品来自土山湾孤儿院，是该院耶稣会士阿洛伊修斯·葛承亮（Aloysius Beck）“经数十年的搜集，积有三千五百件之多”³⁵的中国古物。这些藏品之前由葛承亮“存贮在育婴堂内而不公开”，在迁移到震旦博物院后，这些藏品成为该馆向观众开放的重要部分，“在这三千五百件中国古物中，各种品类都有，年代则自商以下，以致明清……也可略知古代的遗制，兼可以供辨别真伪的参考”³⁶。中国古物陈列室被震旦博物院作为向公众开放的重要部分，一方面体现了其主办者震旦大学坚持的博物馆需要帮助学生“对本国固有文化更可有明确之认识，免贻学人皮毛数典忘祖之讥”³⁷的要求；另一方面作为西方人在华建立的博物馆，它还体现了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关注。

震旦博物院开设了许多临时展览并留下了许多报道，可以一窥其社会影响。比如 1939 年开设“韩伯禄纪念展览”，除开放三楼陈列室外，还附带开放了相关图书室和实验室，以便观众了解各个陈列部分的具体内容，并特地安排了一些展品以辅助说明各部的作用。在图书室“图书柜上将书籍内之特殊图案、分类法关键以及新发明之描写皆置诸案头”；在昆虫实验室中“陈列描绘仪器并当大众表演应用方法及捕虫之技巧，室内设有孵卵器，内飞跃新生之蝴蝶甚多”³⁸。展览的受欢迎程度超出震旦博物院的预期，“其参观者实出吾人理想之外，计自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五日，观众竟达七万人”，不仅引起了观众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而且观众“参观以后均自认增加知识良多”³⁹。不论是从观众数量还是从观众反馈上看，都可以说这一展览发挥了较好的科学普及作用。

上海博物院重建后，原本作为主体的自然史部门藏品“更为丰富”⁴⁰，为了能使这些藏品被国内观众理解，展览采用了非常吸引观众的“栖息地场景复原”（habitat diorama）方式，“以树木石子等配合布置，形如真态，很是自然”⁴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展厅尽头”⁴²展柜中的大熊猫和小熊猫陈列。此外，1934 年上海博物院将原有的英文展品标签和说明尽量翻译成中文，以方便中国观众参观，因此“颇能吸引一般参观人士的兴趣，更能迎合青年学生们的心理”⁴³。在 1936 年的报告中，亚瑟·苏柯仁（Arthur Sowerby）就提到上海博物院“平日里观众川流不息，节假日人山人海”⁴⁴，并且观众数量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1936—1937 年观众数量为 24424 人⁴⁵，而 1939 年一年参观人数就增长到 45000 人，1940 年甚至有 65000 人⁴⁶。在中国举国抗战的背景下仍能有这样庞大且稳步增长的观众数量，从一定程度上看出上海博物院对社会的吸引力。

（三）博物馆服务对象的变化：从服务西方人到服务中国人

徐家汇博物院和文会博物院以自然史标本收藏和研究为主的工作重心是为西方自然史研究和西方人了解中国服务的，而之后的震旦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则将中国人观众作为博物馆服务的主要对象，并重视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作用。

震旦博物院希望发挥收藏辅助震旦大学教育的重要作用。时任馆长郑璧尔在庆祝博物院成立 70 周年的演讲中就提到，博物院建立的一大任务正是凭借其收藏为中国社会“提供自然史相关的高等教育”，以其收藏“促进知识的探索和思考”⁴⁷。因此，震旦博物院希望通过开放这些自然史收藏，能够为“在学学生、旧同学及有志自然科学者实习探求机会”⁴⁸。

震旦博物院在举办的临时展览中也尝试发挥社会教育作用。在 1942 年举办的“中国药物展览会”中，“为增加公众对于国药研究之兴趣”⁴⁹，在震旦大学内为展览组织了配套的两次实验表演和五次专家讲座。这些活动都允许公众自由参加，吸引了许多观众。比如“国产药品对于动物心脏之作用”的实验表演就吸引了“医药界诸同仁及各学校学生计二百人之多”⁵⁰。专家讲座则专为此展览而设，甚至还为配合展览延长展期又专门开办了一次讲座。

上海博物院则通过举办讲座和开展馆校合作的方式推动公众教育，并因此扩大社会影响。上海博物院在 1935—1936 年共开设了 20 次的“博物馆讲座”（Museum Talk），以“博物馆收藏的标本为基础，如果标本不能解释清楚，则在黑板上画图以辅助授课”，并希望讲座能够“成为博物馆公共服务的一个常规特色项目”⁵¹。上海博物院还开展了馆校合作教育的方式。上海博物院重新开幕时，时任上海亚洲文会会长约翰·福格森（John Ferguson）在开幕演讲中就提到博物院应为上海的学生服务、提供实践和学习的场地，并认为这是显示博物馆自身价值的做法⁵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上海博物院在 1936 年针对馆校合作的教育方式设置了教育专员，一方面负责向到馆参观的教师学生开展讲解工作，另一方面负责联络在沪的相关学校并宣传博物院与学校教育的关系⁵³。

二、西方人在华博物馆本土化转向的原因分析

以震旦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为代表的西方人在华博物馆作为中国社会服务转向趋势的肇始，除了上文提到它们对博物馆的要求转变的自身因素外，这一转向不仅受到当时博物馆思想的影响，还有其所在的上海地区文化发展和国人参与其中的需求。

（一）中外博物馆发展的影响

1. 西方博物馆重视教育作用的影响

两座博物馆的转向受到当时西方博物馆界重视社会教育作用思想发展的影响。20 世纪西方“博物馆逐渐被有系统地加以整顿后开始融入近代公共教育系统中”，这一时期博物馆“作为一种公共开放的社会现象出现”⁵⁴。

从上海博物院重建后的展览就可以看出其受到美国博物馆学思想的直接影响。上海博物院采用的“栖息地场景复原”方式是美国 19 世纪自然史博物馆普遍采用的展示方式。这种展示方式往往是博物馆为了重构物种栖息自然环境的典型特征，进而真实地再现被展览者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1889 年，美国密尔沃基公众博物馆（Milwaukee Public Museum）的卡尔·阿克利（Carl Akeley）将麝鼠标本放置到栖息地复原场景中展出，这一场景描绘了麝鼠在重新创造的沼泽中的情景，是“第一个真正的栖息地复原场景”展示⁵⁵；1902 年，美国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展示了著名的栖息地复原场景“四季”（Four Seasons），这是美国博物馆中第一个真正的大型哺乳动物栖息地复原场景⁵⁶。上海博物院的这种陈列方式在当时就被认为“在陈列布置方面悉照欧美各大博物馆”⁵⁷。

2. 中国博物馆发展的影响

西方人在华建立博物馆这一本土化转向不仅受到当时西方博物馆思想的影响，得到发展的中国博物馆对社会教育的重视也是这一转向的推动力之一。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博物馆和博物馆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博物馆的教育作用越发受重视。中国博物馆协会在 1935 年成立时就提到“博物馆在教育上之价值，几倍于学校”，并认为博物馆是“文化之保管人、社会教育之良导师”⁵⁸。当时学者对博物馆的教育价值也有深刻认识，博物馆被认为是“教育肤浅人士可以认识之书”⁵⁹，是“整个社会文化的教育机关”⁶⁰，“比好几十个学校的功能，过无不及”⁶¹，博物馆是学校教育的补充这一观点已成为当时博物馆界的共识。

西方人在华博物馆重视社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此影响。比如“中国药物展览会”在开幕之前有报道认为这一展览“是个冷门的展览会”⁶²。由于重视展览效果和组织教育活动得当，展览开展一周后就有报道称“每日到会参观者约二三千人”⁶³，之后又报道“自开幕以来，颇得社会各界人士之注意，连日往参观者络绎于吕班路上……可谓盛况空前”⁶⁴，为展览组织的配套活动同样引起“参加人士俱感极大兴趣”⁶⁵。上海博物院则明确提出“博物院要为上海社会所用，使公众能在闲暇之余参观”⁶⁶的目标，要求展览“颇能吸引一般参观人士的兴趣，更能迎合青年学生们的心理”⁶⁷，这体现出上海博物院重视本地观众以及为学生服务的社会教育意识。

（二）博物馆的在地需求

1. 上海文化发展带来的需求

1843 年上海开埠后开始了近代化建设过程，至 20 世纪 30 年代成为“东方巴黎”⁶⁸。在这一过程中，上海的市民文化逐步发展起来，上海人对西方“器物、制度到精神的各个层面有了直观、具体的认识与了解”⁶⁹，接受西方文明的精神熏陶成为“一种被市民普遍认同、共同享受的生活方式”⁷⁰。在这种环境下，西方的精神文明成为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需求⁷¹。

这一时期，上海的学校教育也得到快速发展，上海小学教育入学率为 59%，中等学校各学科教育质量高出一般标准的 40%~100%，高等学校占全国总数近三分之一⁷²。当时出现了学校教育需要结合实验教育的需求，“在我国现行教育制度下，凡初中一年级者，有动物学一科目……内容除简述各门代表动物之构造外，并稍及分类学……必须学课与习验并重”⁷³。苏柯仁曾提到博

物馆不仅成为中外学生学习的机构，而且也为成年人的学习提供了平台⁷⁴。

2. 吸收中国人参与运作

前文提到的社会反响热烈的“中国药物展览会”由震旦大学植物部门负责人、生物学教授王兴义和震旦大学医学院教授吴云端合作策划。其中，吴云端作为中国药理学专家，“对中国本草的研究将近六年”⁷⁵，他的参与是这一展览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国人也参与到文会和上海博物院的运作中。文会“1920年后中国籍会员才逐渐多了起来”⁷⁶，著名学者（如胡适、蔡元培、林语堂、伍连德）、政府部门人士（如北洋政府总理王宠惠、上海市长吴铁城）和商业界人士都是文会会员，其中伍连德还在1933年新文会大楼落成时发表过讲话。他们不仅为文会带来了智力支持，更成为其重要的赞助者。例如在文会重建过程中，上海枪械俱乐部、中国业余田径联合会和上海足球协会联合等都为文会提供了捐款，其中“伍连德一人就向文会捐助了20000两”⁷⁷。这些中国社会中坚力量的加入使文会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注重在沪西方人，也开始关注中国的观众，将这些资助回馈给社会是文会和上海博物院的必然要求。

三、结论

从震旦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的转变看，它们开始不再以西方世界的需求为中心，而是围绕中国社会对博物馆的需求开展相关工作。正因为这样的改变，这些博物馆从“西方的”转变为中国的博物馆。

徐家汇博物院和文会博物院作为西方人在中国大陆建立时间较早的两座自然史类博物馆，都有作为西方自然史标本收集和在华延伸的建设目的。这两座博物馆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重新组织，分别成为震旦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变为面向中国社会开放的文化机构。这一转变不仅是博物馆自身认识的改变，也受到这一时期中西方博物馆对教育作用重视的影响。将这一过程称为“本土化转向”，不仅仅是它们向中国观众开放的行为，更多的是这两座博物馆的转变符合当时上海市民对精神文化的渴望，其工作从过去以满足西方对中国自然史的兴趣为中心转向为中国观众的好奇和科学兴趣服务。除了博物馆服务中国社会的做法外，中国人也参与到这些博物馆的运作中，使其从为西方需求服务的外来机构转向对中国本土开放的社会文化机构。这一转向的趋势是震旦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本土化转型过程的具体体现。

注释：

1[1]震旦博物院前身为成立于1868年的徐家汇博物院；震旦大学于1931年重建该馆，命名为震旦博物院。

2[2]上海博物院前身为成立于1874年的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1933年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重建该博物馆。

3[3]Octave Piel. Le 70e Anniversaire du Musée Huedé. 《震旦杂志》1939年第38期。

4[4]吕建昌：《中国首家博物院到底创办于何时》，[EB/OL][2011-03-22][2021-03-11]<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11/03-22/2923053.shtml>。

5[5]Joseph la Servière.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Jésuites de la Province de France (Paris) 1840-1899. Shanghai: l'Orphelinat de Tóu-sè-w, 1915: 194.

6[6]Natural History Museum at Sikawei.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883-11-16: 475.

7[7]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8[8]William Burgess Pryer.Curator' s report,Report of the Counci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75:vii.

9[9]William Burgess Pryer.Report of the N.-C.B.OF THE(R.A.S.).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76:vii.

10[10]Thos.W.Kingsmill.Address to the Members of the N.-C.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79:xx.

11[11]F.W.Styan.Curator Report,Report of the N.-C.B.OF THE(R.A.S.).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84:x.

12[12]《震旦博物院史略》,《上海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会报》1937年4月1日。

13[13]《震旦大学新建博物院行奠基礼志盛》,《圣教杂志》1930年第19卷第6期。

14[14]Octave Piel.Le 70e Anniversaire du Musee Heude.《震旦大学院杂志》1938年第39期。

15[15]同[14]。

16[16]Chronique du 2e Semestere 1930,《震旦大学院杂志》1930年第21期。

17[17]Proceedings,Annual General Meeting.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22:x.

18[18]Charles Davis.Proceedings,Curator' s Report.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23:ix.

19[19]Proceedings,Annual General Meeting.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24:ix.

20[20]Arthur Sowerby.Proceedings,Curator' s Report.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24:x.

21[21]Arthur Sowerby.Proceedings,The President' s Report.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34:xviii.

22[22]Arthut.D.Sowerby.The History of The Shanghai Museum(R.A.S).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34:iv-xxiv.

23[23]同[22]。

24[24]同[3]。

25[25]同[12]。

26[26]同[3]。

27[27]A. Fauvel. Shanghai Museum Report of the Curator for the year 1878.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79: xvi.

28[28]《上海指南》，商务印书馆 1920 年，第 5 页。

29[29]The Honorary Curator' s Report.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0: xv.

30[30]同[12]。

31[31]同[14]。

32[32]上海通社：《旧上海史料汇编（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88 年，第 382 页。

33[33]同[12]。

34[34]同[32]。

35[35]周秀芬：《历史上的徐家汇》，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5 年，第 100 页。

36[36]同[12]。

37[37]《私立震旦大学一览》，土山湾印书馆 1935 年，第 9 页。

38[38]《韩氏博物院七十周年纪念》，《震旦医刊》1939 年第 4 卷第 4 期。

39[39]同[38]。

40[40]赵锦福：《上海的博物院：文化之保管人，社会之良导师》，《上海生活》1939 年第 3 卷第 12 期。

41[41]《晨光团参观博物院记》，《上海青年》1938 年第 38 卷第 23/24 期。

42[42]RAS as Cultural Center in Shanghai, Plan to Link up with Schools in Use of Museum: Chinese Art Display to be Given.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Consular Gazette, 1935-7-24: 157.

43[43]同[40]。

44[44]Arthur Sowerby. Proceedings, The President' s Report.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6:ii.

45[45] 《亚洲文会经济极感困乏:自成立至今将达八十年,博物院在社会极多贡献》,《申报》1937年6月26日第4版。

46[46] Arthur Sowerby. Presidential Address.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0:16.

47[47] 同[14]。

48[48] 同[13]。

49[49] 《震旦博物院分实验表演与专家讲演》,《申报》1942年4月24日第2版。

50[50] 《震旦药物展览二周记述》,《申报》1942年4月30日第5版。

51[51] 同[44]。

52[52] John Ferguson. The Reopening of Shanghai Museum(R. A. S.).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4:ii.

53[53] 同[45]。

54[54] 徐玲:《博物馆与近代中国公共文化(1840-1949)》,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4-26页。

55[55] Marjorie Schwarzer. Riches, Rivals and Radicals: 100 Years of Museums in America.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 2006:121-122.

56[56] Sue Dale Tunnicliffe. Annette Scheersoi. Natural History Dioramas History: History,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al Role. New York: Springer, 2015:18.

57[57] 同[40]。

58[58] 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博物馆协会缘起》,《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1935年第1期。

59[59] 傅振伦:《苏维埃联邦博物馆概观》,《苏俄评论》1937年第11卷第2期。

60[60] 荆三林:《民俗博物馆在现代中国之重要性》,《学术世界》1936年第2卷第2期。

61[61] 杨钟健:《记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国外印象记之九》,《文讯》1948年第3期。

62[62] 《中国药物展览会》,《申报》1942年4月10日。

63[63] 《药物展览会讯》,《申报》1942年4月18日。

-
- 64[64] 《震旦博物院分实验表演与专家讲演》，《申报》1942 年 4 月 24 日。
- 65[65] 同[61]。
- 66[66] 同[20]。
- 67[67] 同[40]。
- 68[68] 曹红亮、吴颖静、俞美莲：《乡村振兴视野下上海近代以来农耕文化的流变》，《上海农业学报》2020 年第 36 期。
- 69[69] 钱文亮：《论近代上海城市转型的历史与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6 期。
- 70[70] 徐赣丽：《建构城市生活方式：上海近代文明化及其动因》，《民俗研究》2020 年第 5 期。
- 71[71] 熊月之、周武主编：《上海：一座现代化都市的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年，第 133 页。
- 72[72] 苏智良主编：《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态》，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年，第 15 页。
- 73[73] 高纯甫：《亚洲文会博物院脊椎动物标本记略》，《华东联中期刊》1940 年第 1 期。
- 74[74] 同[42]。
- 75[75] 刘粹公：《中国药物展览意义与感想（上）》，《申报》1942 年 5 月 4 日第 4 版。
- 76[76] 同[7]。
- 77[77] Proceedings, Annual General Meeting.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3:ix.